

Zhuanxing yu wending

转型与稳定

Zhuanxing yu wending

张雷 程林胜等·著

Zhuanxing yu wending

学林出版社

张 雷 程林胜等 ■ 著

转型与稳定

Zhuanxing yu wending

学林出版社

转型与稳定



作 者 张 雷、程林胜等
责任编辑 钱丽明
封面设计 鲁继德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68461 传真:63768540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8 万
插 页 4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16-701-3/D·23
定 价 18.00 元

导 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 转型与稳定问题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当代中国正处于本世纪以阶级斗争为推动的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以来又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这是中国二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或必然要经历的一种自然过程。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整个利益结构和体制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调整和变动。而中国这一社会转型之所以得到实质性的驱动,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于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本能的、强大的、历史性的呼唤;同时,又是同作为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接相联系的。因为正是这次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开启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1979年,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①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判断,充分表明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5页

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了历史的巨大曲折之后的成熟与清醒,更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实现伟大转折、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的历史主动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自觉地宣布过社会主义发展有着历史转折时期。就这一点,说明了我们党对历史转折的发展寓意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有位研究历史哲学的著名学者曾这样写道:“以往,历史转折意味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形态的变革;现在,历史转折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力革命;以往,是被动地等待客体成熟的历史转折观,现在,是自觉能动地改变历史过程的历史转折观;以往,历史转折意味着政权变易,现在,历史转折意味着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的理性化社会转型。”^① 这清楚地说明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内在活力有了新的认识,深化了对历史发展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的理解。

而邓小平之所以特别强调“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除了告诉人们:搞社会主义还要来一次历史的重大转折——这是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事,现在却必须承认这一点,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观念的更新,它间接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存在着阶段性的飞跃的必然性。尤其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期间要经历若干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生产力的革命。还在于这种判断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一种对时代精神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审时度势的准确把握,来自充满着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忧患意识的启迪,唯有这种启迪才构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自觉的历史转折意识。

^① 张雄:《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应当看到,邓小平思考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命运与出路时,从来也没有忽视过对当代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巨变的观察。如果审视已经走过来的昨天的百年世界历史,就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邓小平代表我们党自觉把握伟大历史转折的深邃意义。

无疑,已经走到本世纪末年的20世纪,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人们回眸与思索的。美国有位人类学家曾把16—19世纪称为“小世纪”,把20世纪称为“大世纪”,其原因不外乎是说欧洲人走出中世纪后,直到20世纪才发生了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变革和观念的嬗变。但另一位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思想家则提出,理解20世纪的意义在于“伟大的过渡”。^①其实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最具有震撼力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即“理性化的社会转型”。^②

本世纪50年代以来,是世界历史上出现空前未有的全球性大转折时期。世界未来协会主席、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科尼什把它称为人类痉挛性变革时期,^③也有人称它为“人类史上的第二次大分野,其重要性只有从野蛮时期转化为文明时期的第一次历史转折才可以同它比拟”^④。这种历史转折鲜明地表现在: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的自觉转换。不少西方学者用“post-”这个词来揭示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转换的性质。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拉尔夫·达伦多夫的“后资本主义社

① 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2页脚注。

② 张雄:《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③ 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④ 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2页。

会”；阿米泰·艾特奇奥尼的“后现代社会”；吉迪思·绍伯格的“后福利社会”；《社会政策》杂志的“后匮乏社会”等。可对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人们更多地把这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性质理解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等。

显然，西方社会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一次工业革命”^①，革命的目标已不是 18、19 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而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革命的目标尽管有着与西方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某些类似之处，但其内容则有着很大不同。它主要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体制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转折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毋庸讳言，一个“穷”字，曾困扰了整个一个近代中国。由于“穷”，于是便弱，便可能受人欺侮；由于“穷”，于是便乱，总是燃起一次次“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常常可能政治无序，社会动荡；由于“穷”，于是便愚，教育、科技、文化落后，民智难开。穷之为祸，于理极明。而时至创立新中国三十年之后的 70 年代末，事实上一个“穷”字——生产力水平低下仍继续困扰着当代中国。

幸运的是，历史的发展选择了邓小平。当时，消除旧中国遗

① 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12 页。

留下来的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使命,落到了刚刚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身上。他要在一个生活着 12 亿人口的国土上,在依然有 10% 的人口即 2 亿人仍然不能温饱的国土上,要在依然是 80% 的人口从事手工方式的农业劳动的国土上,要在有数千年封建历史、一百年殖民历史、一直延续到本世纪 70 年代的自然经济历史、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历史的国土上,建设起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项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空前伟人,又无比艰巨的工程,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对此,邓小平恰恰要比同时代其他任何人更具世界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有着更多更为深刻的超凡的理性认识。他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穷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①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思想。第一,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承认了我们仍然属于贫困国家这一事实,这一结论不是单纯民族史的比较,而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23 页。

来自世界历史进程的眼光。第二,他结束了那种物性化地等待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自发创造财富的思维方式,把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作为检验社会制度优越性是否实现的基本尺度。

应当说,正是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历史转折意识,才真正地使中国人第一次感到 20 世纪世界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强大牵引力;感到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上客观存在着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差的紧张和压力。

于是,随着世界窗口的打开,我们明白了如此事实:自 5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建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转折的客观冲击力,在剧变着社会、瓦解着积淀已久的陈旧生活方式,震撼着一切被长期禁锢的近乎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对于中国来说,已不允许再有任何犹豫或徘徊。重要的是从“文革”灾难的历史深渊中迅速走出来,振作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创造,改革图变。

当历史的脚步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末之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历史转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有着深刻发展寓意的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从 20 世纪一百年的历史来看,我们中华民族经历的三次历史性的巨变,实际上反映了从近代(主要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百年衰败、百年救亡和争取百年振兴的全民族奋斗的过程,或者说这是一个把衰败、落后、挨打之下压抑了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发展起来的充满悲壮的历史进程。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一种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以来中国落后面貌、重新振兴中华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初级

阶段的理论树起了中国发展、振兴的新的路标。这个路标表明：我们中国要用一百年时间实现人家用了几百年实现的现代化目标。也就是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崭新术语，它随着全球性改革浪潮的推进，已渐渐成为人类理解当代社会发展的一般信念。黑格尔指出：“发展是一个熟知的观念。但哲学的特点，就在于研究一般人平时所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间曾经运用并应用来帮助他生活的东西，恰好就是他所不真知的。”^①

社会转型由于它降生于人们对恍若隔世般的当代社会剧变的历史直觉中，所以，人们对此概念的查审，缺乏理解的共同基准。一些人习惯于用直观表象的认知形式来理解概念的内涵，把社会转型的本质理解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指标性转变；或用新闻广角手法，把社会转型仅仅表述为社会剧变现象的种种罗列；还有人对概念的反思剥离了概念的普遍性，即思想，把认识驻足于某一门类的经验知识或实证科学中。应当指出，用概念的属性或外延来说明概念的本质，实属必要。尤其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来展示社会转型的特征，它为我们理解当代历史转折与社会转型的直接关系，提供了诸多信息，意义颇大。可是，把认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借助哲学的反思形式。

社会转型范畴在国内一些工具书中尚无条目，^② 它之所以在学术界仍处在一个极难确定的阶段，其原因在于该范畴出现的时间不很长，人们只习惯于描述性地运用此概念，把概念的理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5页。

② 有些工具书有“社会转型”条目的释义。

解,仅仅停留在未加确证的直觉上,缺乏对概念产生的语义背景进行透视。以往的思想家、理论家们习惯于用“历史转折”、“社会革命”、“历史的大跳跃”等术语来表达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可是,今天的学者们为什么更加喜欢用社会转型范畴来表达当前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呢?马克思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大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社会转型范畴产生的语义背景正是当代现代化的生动历史实践。我们不可忽视如此事实:现代化社会转型主要受当代新科技革命的运作和牵引或由当代知识经济力量带来的巨大冲击所致。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不会表现为法国大革命式的阶级斗争的推动,它是一场以科技力量、科学精神带动社会体制和结构的自我转型。从转型的启动到转型的过程,每一步都说明了:自 50 年代兴起的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彻底改变了地球上一系列传统的生产领域,促使它们产生了质的飞跃,而且深入影响到当代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生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科学技术的物化带来如此强大的冲击波有力地瓦解着原型社会的物质形态,并以它无形的能量通过对历史行为主体的观念渗透,荡涤原型社会的精神结构,为新体制、新结构的构建和生成,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丹尼尔·贝尔在分析后工业社会转型原因时写道:“如果社会变得更多地依赖技术和新发明,就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一种危险的不确定的性质。”^① 这种不确定的性质正是当代社会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转型生长点。

社会转型一词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转型”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在生物学中,transfor-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 34 页。

mation 为生物演化论。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而“转型”在国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被诠释为“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糖核酸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①。转化与性变乃是认知概念的关键。西方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有的称演化)的意义的转换和性变。通常是指传统的原型社会的规范结构向“发展逻辑”的更高层次的演化(这里的“发展逻辑”乃是一种实践模式,它是指社会结构系统加以理性重建,并成为具有包容力和现代性的结构层次模式)。显然,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有着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modernization paradigm)社会结构转换的内涵。在当代颇有影响的 D·哈利生撰写的《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社会转型一词多处被运用。如他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经济结构的转型。^②近年来,随着第三世界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对社会转型问题引起兴趣,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在《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直接把英文 Social Transformation 译为社会转型,并指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的过程。”^③《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亦认为:“当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快速推进中。”^④中国社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4页。

② David Harrison: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P56,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88.

③ 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第17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哲学(1994—1995):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第1页。

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有同志把社会转型范畴作了探索性界定：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①它说明了国内对此范畴的研究已由描述性向解释性过渡。

怎样把社会转型范畴由社会学层面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研究历史哲学的著名学者张雄教授认为：必须变换思维模式，即由社会学从结构变动到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转向由人（历史主体）到结构变动再到人的思考。由此出发，考察社会转型的哲学视角应从三方面展示：其一，社会转型的主体不应是社会结构，它应当是从事现实历史实践活动的人。其二，揭示社会转型的本质，应当从历史的积极能动因素——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方面去思考，从主体的“能动生活过程”去思考，而不是从消极的、静观的、自发的“生活过程”去思考，更不是从某种亚实体化“规律教条”去思考。其三，寻求社会转型的意义领域应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把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断与历史计划、历史的上升运动和社会发展观念联系起来。由此，他认为可以把社会转型范畴作如下哲学界定：

“社会转型乃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历史转折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当社会生产力提出质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对原型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地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②

很清楚，在这里——作为哲学范畴的社会转型与作为社会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

② 参见张雄：《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学范畴的社会转型有着理解的一致性,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系统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所不同的是,社会学语义范围是现代化过程;哲学语义范围乃是历史转折的主体实践过程。前者是社会转型的狭义说明,后者是广义的表述。按照哲学的定义,历史上凡是具有历史转折性质的“社会深刻变革”、“历史主体的自觉建构”、“社会结构系统的新旧转换”等特征的社会转变都可以称之为社会转型。如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等。

从历史转折概念演化出社会转型概念,说明人类对历史演变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人类自觉利用社会变革的手段来推动历史进步的“理性狡计”。因此,社会转型范畴的出现,意味着历史认识论的提升,它与以往的“历史转折”、“社会变迁”、“社会震荡”、“社会革命”、“社会改良”等概念有着理解上的不同。如社会转型不是纯自然历史的演化,而是人类自觉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社会转型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轴的社会转型,另一种是以理性化规范结构的现代化过程为中轴的社会转型,简称理性化社会转型。两者的共同特征是:都是发生于具有历史转折特征的历史客观态势中;都是社会结构、体制的新旧变革;转型的结果都将导致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动;它们都是具有特殊内容的社会革命。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以阶级斗争为中轴的社会转型是阶级社会实现社会形态转变的重要形式。它主要通过先进阶级意识的觉醒并通过政治集团或党派斗争的实践,来改变原型社会政权的性质来实现。以理性化规范结构的现代化过程为中轴的社会转型,主要通过当代科技革命或当代知识经济理性的力量和集中代表历史主体的当政领导层的合理化决策导向,在不变更原社会形态的范围内,实行有计划、有步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结合的社会结构系统

的转换,它体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意志,也体现了社会的现代化演进的观念。另外,有的历史哲学研究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与社会革命在表达上也有不同之处。社会革命更侧重于阶级、政党以及社会实质性变革的关系和态度,它似乎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社会转型侧重于完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质性变革的联系,除了政治关系外,还需要关注经济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科技发展关系等等。它应属于社会哲学范畴。总之,两种形式的社会转型都是历史的客观发展对人类提出的两种文明变革的模式,它们都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文明加速器,对社会的演化创新有着不同的重要作用。当社会需要一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来加速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时,阶级斗争形式势所必然,不可缺少。当社会发展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历史既不表现出重大社会形态更替的趋势,但又鲜明地展示了特定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客观上提出系统地、全面地调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体制时,理性化社会转型便有着存在的意义。从现实与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从科技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的特征来看,理性化社会转型的作用将愈来愈被摆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这种发展的形式与发展观念乃是20世纪的人类告别过去迎接未来最有价值的礼物。^①由此看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场全球性历史变革在许多国家的显现,主要是理性化的社会转型。我们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毫无疑问也当属此类。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转型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各种艰难的阻力,都要靠历史主体的自身力量来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① 参见张雄:《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04—205页。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褻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趋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这种叛逆在固守原社会的体制的人看来,是“恶”的行为和意念。实际上这恰恰正是那些锐意变革的创造性人物射向旧世界的有力武器,同时,这种武器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某些行为主体的“苦遇”,甚至出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倒下,或者在春寒中死去”的现象。犹如车轮的转动靠能量的不断补偿那样,社会新旧体制的转变离不开通过历史主体曲折、坎坷的种种磨难作为沉重代价而得到补偿。没有这种代价,社会转型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成功。这也就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也是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的社会转型必然要付出的成本问题。

那么,如何以较小的转型成本(代价)来实现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一般说来,最好的选择是能够在保持社会稳定中进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极力维护和追求的最理想目标,可却又往往难以做到。然而,在当代中国,在二十年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推行的是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一种致力于避免引起大的社会震荡(不出现全国性的社会不稳定局面),即使之能够在总体上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推进社会转型的实践。但是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经过二十年百折不挠的努力和持续渐进的推进,现在已经到了质的飞跃的关键时刻,能否完成这一质的飞跃,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尤其是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已进入到攻坚阶段。一方面,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举世公认;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到了不解决没法前进的关键时刻。因此,这对实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构成了严重挑战。而其

中最大的挑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问题。

“社会是按照一定规范整合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它按照既定的一套行为规范维持社会秩序,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规定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向。”^① 社会稳定是一种社会运行状态,它以社会规范整合效力的有效发挥和运行的有序性体现出来。从社会结构和功能态势上看,社会稳定是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稳定、人群文化价值观念心理及行为稳定的统一体。但从社会状态的最终表现来看,社会稳定是社会人群行为的秩序化,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整合规范的认同和接受。由于“社会运行状态最终要用人类自身的状态来说明”。^② 所以,研究社会稳定问题的出发点应是社会人群行为状态。那么,促使社会人群行为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在哪里? 回答是:社会人群行为状态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人群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斗争。其理由如下:

第一,追求不断扩大的利益是社会理性人(具有正常思维能力和正常行为能力的社会人)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促使人们为不同的利益目标而奋斗,生命不息,奋斗的脚步就不会停止。人的利益欲望(包括经济利益欲望,政治利益欲望,以及缘于人的需要产生的名望地位等欲望)是不断提高的,但社会现存利益却是有限的,一个人群占有或过多地占有某方面利益,则意味着另一个或另一些人群不能占有或只能较少地占有这方面利益。这样,人群之间必然要发生利益矛盾和利益斗争,矛盾和斗争的展开必然促使相关人群行为发生变化,若这种变化与社

①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